

探索可行的道路
鄧小平發起中國的
「改革開放」

序言

PROLOGUE

在毛主席去世和推翻「四人幫」之後，中國改革道路的整個思路是在改革早期樹立起來的。1978年，中國共產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先開始了農村改革，使之成為後來改革的指導方針。即使是中國體制改革的這第一階段也是一個漫長的制度實驗過程。直到1983年「包產到戶」熱潮席捲全中國時，還未完成。¹ 每年，至關重要的關於農村改革的「一號文件」總結上一年的成果，指示下一年農村改革的方向。鄧小平在該過程中一直是最重要的人物。

1979年6月我有幸成為內維爾·馬克斯韋爾帶領的牛津大學代表團的成員之一。² 該代表團對剛剛在農村人民公社開始的改革進行了第一手的研究。在該研究過程中，1979年6月21日，我

們十分榮幸有機會與副總理鄧小平進行了一次長談。

在這次長談的過程中，他對經濟改革的思想進行了詳細闡釋。在此時，他尚不知道中國在今後幾十年裡要朝哪條路轉變。他沒有體制改革的宏偉藍圖。從他所闡釋的主要觀點中凸現出的是，完全注重實效的「從實踐中尋找真理」的思想，他主張漸進地推行改革，觀察處在拷問中的轉變是否可能給全體大眾帶來好處。他向我們概括闡述了在農村進行的探索性改革，第一步意在證明這一具有代表性的方式適用於整個體制轉變歷程（2003年還在進行中）。每一步漸進的改革都有助於在整個歷程中建立彼此加強、正面反饋的效應。一旦中國走上了這條路，累積的因果關係創造出強有力的「道路依存」效應，從而使國家脫離業已建立的發展道路變得越來越難。這個過程最關鍵的部分就是起點。它確定球朝前滾的方向。這為後來所有的改革嘗試建立了總體思路和模式。

鄧小平副總理在改革伊始，對我們代表團所說的某些要點如下：

中國很窮。貧窮不能證明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我們的總體目標是使社會中的每一個人富裕起來。這要花很長時間。我們總的辦法是鼓勵先進分子率先富裕起來，其他人接著富起來。

實踐出真知（實事求是）。如果我們能使所有中國人民的平均收入實現增長，就證明我們的實踐是正確的。如果我們將來的經驗證明我們一直在擁護社會主義、防止資本主義，那麼這就證明我們的政治實踐是正確的。

我最近訪美的時候，有人問我：這不是在走資本

PROLOGUE 序言

主義道路嗎？但是，積累過程中的所有贏利都將歸於人民，因為所有權屬於人民，儘管人民之間還存在收入差距。因為我們有全體人民所有權，兩極分化不會發生。所以，資產階級不會出現。在中國，高收入的人微乎其微。我的工資是中國最高的，但是我保證比在座的任何一位外國人都要低。而且，這樣的工資水平在較長時期裡不會增長。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經濟政策和實現四個現代化的努力是建立在四項原則的基礎上的：社會主義、人民民主專政、馬克思列寧主義和毛澤東思想。在這些原則下，經濟增長的收入和利潤都將歸於集體和人民。

我們認為，某些人民公社的收入有顯著增長，是件好事。如果一批人民公社，例如10%或20%，手頭寬裕起來，那麼國家就沒有必要為了增加他們的積累，繼續給他們提供補助了……國家就可以集中精力幫助落後地區。總之，我們應該幫助某些人民公社先富起來，然後國家會幫助貧窮的人民公社富裕。那些率先富裕起來的人民公社可以為別的人民公社樹立富裕的榜樣。當然，不平等將在較長時期裡存在，但是，「富裕」是一個相對概念，我們不是指的西方意義上的富裕。我看到兩個有類似自然條件的生產隊，一個人均收入大約一百元，另一個祇有二十多元。差距就出在管理能力上。請管理良好的人民公社等著落後的趕上，這合理嗎？我們在全國範圍內的政策是，允許某些因為良好管理而實現高收入的地區或人民公社走在前頭。

我們不怕這種不平等。我們能找出辦法來防止它。總而言之，基本的事實是保留集體所有權。到目

前為止，即使上海周邊最繁榮的人民公社人均收入也祇有大約三百元。我們的政策是鼓勵那些較高收入的把更多的錢放在積累上，購買機器，使經濟多樣化，把他們的經濟推向更高水平。

我們今天在農村地區遵循的原則跟「文化大革命」之前完全一樣。「按勞分配」原則在20世紀50年代確立。這不是新鮮事物。「四人幫」摧毀了這些政策。這損傷了農民的熱情。在「四人幫」時期，不管他們怎麼努力工作，收入都是一樣的。

中國今天仍然很窮。目前還有一些問題沒有解決辦法，但是我們會在今後找到解決辦法。例如，現在還沒有個人所得稅。如果哪一天在集體和個人之間出現了顯著的不平等，我們可以採取個人所得稅來糾正這種不平等。但是，現有的收入太低，不能批准實施。這祇是一種可能性。也可以採用其他的辦法來糾正這個問題。

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如果社會主義意味著貧窮，那麼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在哪里？在過去十年裡，我們因為過分的平均主義和過激的左傾，吃了很多苦。四人幫寧願要貧窮的社會主義而不要富裕的資本主義。

我們也因為企業當中的平均主義吃了很大的虧。不顧人們的工作怎樣，收入都一樣。那些管理良好的企業應該比管理不善的企業收入更高。這就迫使管理不善的企業改善管理。過去，虧損企業跟運作良好的贏利企業拿一樣的錢。我們不應該以同一種方式對待這兩類企業。³

「摸索前進」成功

由鄧小平發起的中國改革戰略的成果是曠世未見的、最具爆炸性、持續時間最長的經濟增長時期。甚至亞洲金融危機都不曾削弱中國前行的勢頭。而且，這種增長發生在世界上一個廣闊的區域，因為中國擁有的人口佔世界總人口五分之一多。因此，中國史無前例的成功發展的深遠意義使其那些後來居上的國家黯然失色。

自1978~2001年的20多年間，中國的人均GDP年增長率是8.1%，工業增長率是11.5%，⁴使中國在這一時期處在世界經濟增長成就的尖端。如果考慮到中國不同地區間巨大多樣性的情況，這的確是非凡的成就。它不僅僅是克服了毛時代低效率帶來的「散漫拖拉」。沒有任何其他的計劃經濟達到過這樣的成績。它也不僅僅是受益於「落後的優勢」。沒有任何其他發展中國家實現了這樣的成就。⁵

截止2001年，中國在大量領域中的產品生產爬上了世界首位，包括穀類、肉類、棉麻、水果、粗鋼、煤、水泥、化肥和電視機。它成為世界上最大的家用電器品的生產基地。2001年，中國生產了9600萬臺電風扇、6000萬架照相機、4100萬臺彩色電視機、2500萬個移動電話、1400萬臺家用冷藏箱、1400萬臺家用洗衣機、1100萬部真空吸塵器、1100萬臺家用冷凍箱和1100萬臺錄影機。

中國的出口從1978年的181億美元增長為2001年的2660多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超過12%。其製造業產品出口同期從90億美元增長為2400億美元，年平均增長率超過15%。製造業產品出口佔中國整個出口的比重從1978年的50%上昇到2001年的90%多。

中國已經成為全球企業外來直接投資的最大焦點。2001年，大陸外來直接投資的總量達到3950億美元，香港特別行政區達到4520億美元，共計8470億美元。⁶ 該總量大大超過了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區的總和，後者在2001年是6930億美元。它也大大地超過了亞洲其餘地區的外來直接投資總量：後者包括東亞（包括日本）、東南亞和南亞外來直接投資的總量在2001年為4340億美元。它更使前蘇聯和東歐地區黯然失色，後者的總量在2001年是1630億美元。

更為重要的是，這一時期史無前例的增長使中國人民的生活發生了全面轉變。中國人民的實際人均消費從1978年到2001年增長了七個百分點。⁷ 如果把這一時期中國人口增長了3.13億考慮在內，這一成就更是顯著。這一時期不僅中國人民的生活水平發生了變化，而且在改革開放的早年，就實現了曠世未遇的絕對貧困的最大幅度的減少。世界銀行估計中國絕對貧困人數從1978年的2.7億（佔總人口的28%）下降到1985年的9700萬（佔總人口的9.2%）。⁸

對於這種成就的原因和意義有許多激進的闡釋。在2001年北京召開的一個國際會議上，一位中國經濟學家發表了激動人心的講話。他說，雖然中國在過去20年裡成就卓越，但是如果政府祇要停止干預經濟，增長率至少會翻倍或更多倍。該講話贏得了與會的國際商業人士的熱烈掌聲。另一個不同的解釋是，中國之所以取得如此成功的原因恰恰在於，儘管面臨強大壓力和困難，國家一直繼續在解決市場失效問題方面發揮關鍵作用，儘量調控增長過程中的分配結果、調節中國與全球經濟的互動方式。

註釋：

- ¹ 應該注意的是，農村改革的第一階段並沒有以農地的私有化而結束，相反，鄧小平在他的講話中強調，土地仍然是集體所有。在直至今日的整個改革過程中，土地一直是集體所有的。2002年的《農村土地合同法》代表了長期而複雜的農村土地權改革的最近發展階段。新法律以詳盡的方式重申了1993年的基本政策聲明，農民有資格享受30年（一代人）的土地使用權，這足以回收幾乎任何形式的農業投資價值（《南華早報》2003年2月12日）。以一種既能保持農民積極性，又能維持社會凝聚力的方式進行農村土地權實驗的周全考慮是農村社會經濟問題不再嚴重的主要原因。很難想像，20世紀70年代末如果採取徹底進行土地私有化和「孤注一擲」的政策，其後果將會是多麼悲慘。
- ² 內維爾·馬克斯韋爾在中國廣為人知且倍受尊敬，因為他就中印邊境爭端問題所發表的權威性著作《印度的中國戰爭》，同時也因為他對中國農村經濟的分析。代表團由內維爾·馬克斯韋爾、基思·格里芬、羅傑·海、阿什瓦尼·賽什、馬什·馬歇爾和我組成，由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副所長王耕今陪同。
- ³ 這些觀點摘自我本人在那次會談的筆記。
- ⁴ 這裡和以下的兩段中引用的數據出自《中國統計年鑒—2002》。
- ⁵ 我無法從邏輯或證據角度來考察Sachs和Woo所揭示的觀點，即與前蘇聯「過於工業化」的缺點相比較，中國不同尋常的成就可以解釋為「落後的優勢」。「落後的優勢」可以同時解釋南亞的緩慢增長、拉美的浮動性增長或者非洲次撒哈拉地區的災難性失敗以及中國爆炸性的增長嗎？有關更多的對Sachs和Woo觀點的批評，見Peter Nolan：*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llective Farms*。
- ⁶ UNCTAD：*World Investment Report (2002)*，第311頁。應該警惕的是，這些數據中存在相當成分的雙重計算，但是無法準確地確認其程度。即使把這一點考慮在內，中國大陸加上香港仍然存在外來直接投資總量的顯著增長。
- ⁷ 《中國統計年鑒—2002》。
- ⁸ Peter Nolan：*China's Rise, Russia's Fall*，第14頁。